

SHICHANG YIWU

市场义乌

——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

◎ 陆立军
◎ 白小虎 著
◎ 王祖强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浙江人民出版社

市场义乌

——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

SHICHANG YIWU

◎ 陆立军
◎ 白小虎 著
◎ 王祖强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贸易/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0
ISBN 7-213-02675-5

I.市… II.①陆…②白…③王… III.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义乌市 IV.F7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978 号

市场义乌

——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

陆立军 白小虎 王祖强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黄建光
封面设计 顾页
责任校对 戴文英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杭州市拱康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4 万
插 页 4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675-5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

美与是一
了非半值
得研矣哉
月象

于光远
于光远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教授题词

培育新人
探索新路
开创新业
建设新城

祝贺浙江省软科学研究所
义乌模式研究室推广十周年
丰硕成果

厉以宁

二〇〇四年四月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题词



义乌小商品市场1982年宣布开放，并投资9000元沿街设700个水泥板摊位。这便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义乌宾王市场与商城集团外景



义乌国际商贸城外景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会展中心全景

市场先发 商贸主导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义乌模式” (代序言)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之前仅属中国的中等发达地区，但是近几年来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年均纯收入一直居全国各省、自治区之首，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面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之“谜”，经济界、理论界和新闻界纷纷作出了不同的概括，如“市场大省”、“乡镇企业大省”、“老百姓经济”等。而我认为，浙江的最大优势是市场先发优势，以集中交易为特征的专业市场，是浙江市场取向改革的一大特色和重要成果。正如浙江人自己所总结的，浙江兴办专业市场的经验就是“办一座市场，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浙江专业市场的生成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变革。当然，市场要以产业为依托。以民营企业、民办市场、民有资本、民间人才的有机结合为特色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最大的亮点；数以万计的民营企业，是浙江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民营企业首先是从自然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比较差的温州、台州等地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土地贫瘠，资源条件很差，加之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甚少。但现在看来，上述劣势反而变成了优势：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经济以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只好横下一条心发展民营企业；二是当地善于务工、经商的民间人才得以大显身手，没有企图阻止民营企业发展的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即使有也形不成气候。温州和台州的经济繁荣引起了浙江省内各地乃至其他省份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仿效，由此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温州模式”。

在浙江各地学习、借鉴“温州模式”，寻找自身发展道路的努力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亮点，这就是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县级市——义乌。义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也很差，但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

初,义乌人就向温州人学习兴办民间专业市场的经验,并且同自身历史悠久的“鸡毛换糖”传统结合起来,办起了小商品批发市场。而今温州的民间专业市场大多已经或开始转型,有的甚至趋于衰败,但义乌小商品市场却越办档次越高,越办生意越红火,商品成交额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国同类市场之首,而且一部分商业资本进入国际贸易领域,另一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联动发展。2002年,义乌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56亿元,财政收入达16.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4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688元;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达229.98亿元,外贸出口总额达15亿美元。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2000年公布的数据,在全国百强县(市)综合实力排名中,义乌位居第20位,在浙江省各县(市)中居第4位。义乌市正在向国际性商贸城市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的一大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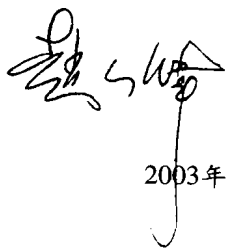
本书第一作者陆立军教授是一位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颇有建树的中年经济学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在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深入义乌亲身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且坚持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他不仅开展了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力求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基本理论层面加以探索,从而既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成果,还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带出了一批青年学术骨干。《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一书,就是由他所带领的学术团队所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这本书分析了被媒体称为“华夏第一市”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的演变轨迹,并通过对综合性专业市场这一“龙头”的分析,揭示了义乌独特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这对于通过义乌这一案例,认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难历程和客观规律,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该书是一本总结经验的理论著作,不仅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历程,而且涉及义乌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因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该书是一本研究市场秩序扩展与区域经济成长的经济学专著,不仅吸收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术成果,而且吸收了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一系列前沿学术成果,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以市场秩序扩展为主线,从专业化交换组织——义乌“敲糖帮”、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人群体的创新行为、地方政府的开明决策等角度阐述了小商品市场的溯源和形成,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信息经济等角度阐述了小商品市场的交易效率和集聚效应,从“划行归市”、联托运市场扩展、义乌政府的行为模式等角度阐述了小商品市场的优化和未来发展方向,从市场与产业、城市的

联动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义乌的新定位和“义乌模式”的创新。全书各章节之间分工合理、逻辑性强,整体性和完整性都比较好。总之,该书是一本研究县(市)域经济市场化经验的力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践价值和史料价值。

作为出生于浙江金华的经济学者,我对义乌、永康、东阳等金华周边县(市)经济的崛起感到十分高兴;对于经济学界的同仁研究、总结这一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欣慰。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应作者和出版社之约,写下上面这些话,以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8月

目 录

绪论:市场秩序扩展与“义乌模式”创新 / 1

第一篇 义乌市场溯源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

第一章 小商品市场的溯源与发展历程 / 25

一、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素描 / 25

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溯源 / 31

三、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 / 38

第二章 专业化交换组织与义乌“敲糖帮” / 46

一、专业化分工与专业化交换 / 47

二、义乌历史上特有的专业化交换组织——“敲糖帮” / 52

第三章 地域性商人群体与小商品市场创新 / 67

一、义乌商人的经济哲学与商业文化 / 68

二、地域性商人的群体特征 / 73

三、商人群体的创新行为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 / 78

第二篇 小商品市场的结构优化与形态升级

第四章 小商品市场的交易效率和集聚效应 / 89

一、市场的内在矛盾与小商品市场的成长 / 90

二、小商品市场的结构与效率 / 98

三、小商品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与范围经济效应 / 107

第五章 义乌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小商品市场结构优化 / 111

一、义乌小商品市场和义乌市场体系 / 111

二、市场规模扩张与小商品市场结构优化 / 116

三、义乌要素市场的发展与特点 / 121

第六章 联托运市场扩展与现代物流中心 / 132

- 一、专业化运输服务与联托运市场 / 132
- 二、“合作集团”扩展与联托运市场的制度变迁 / 141
- 三、从联托运中心到现代物流中心 / 149

第七章 市场制度创新中的义乌地方政府 / 156

- 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与小商品市场扩展 / 157
- 二、市场管理创新与新型的市场开发实体 / 165

第三篇 市场秩序扩展与区域经济版图重构

第八章 小商品贸易中心与国际性商贸城市 / 175

- 一、义乌独特的城市化路经 / 175
- 二、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与构架 / 183

第九章 市场秩序扩展与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 188

- 一、市场先发优势与新兴区域经济增长极 / 189
- 二、新兴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与扩张效应 / 194
- 三、市场秩序扩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未来图景 / 206
- 附表 / 214

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十年小结(代后记) / 218

绪论

市场秩序扩展与“义乌模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等三大农村工业化模式,这三大模式从所有制(资本形成和资本来源)角度反映了我国不同区域农村工业化的主要特点。很显然,“义乌模式”^①不同于以集体工业为起点的“苏南模式”,更不同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模式”。“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与“温州模式”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

“温州模式”的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资本和区域商业传统。也就是说,在温州,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义乌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温州模式”十分接近:从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讲,都是“专业市场+农村工业化”;从原有的经济基础看,两者都是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投资极少,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不得不在计划经济壁垒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所有制角度看,都是民间资本主导,两者的原始资本主要是通过个体工商户走南闯北逐渐积累起来;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来说,两者都是自组织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本质上,“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不过,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换组织成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义乌模式”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理由,也是研究“义乌模式”的意义所在。

^① 笔者在1999年、2001年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使用“义乌模式”的概念,此后也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一概念,但总的来说,关于“义乌模式”的研究尚未在学术界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参见陆立军:《“中国小商品城”的崛起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1期;陆立军、白小虎:《从“鸡毛换糖”到企业集群——再论“义乌模式”》,载《财贸经济》2000年第11期。

“义乌模式”与“温州模式”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其一,“温州模式”基本上从家庭工业起步,以家庭工业为支撑;而“义乌模式”则从小商品市场起步,并一直以小商品贸易为龙头。在温州,市场是连接家庭工业与消费者的桥梁或中介;而在义乌,市场则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二,“温州模式”的成因主要是由民间力量推动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而“义乌模式”虽然也是由民间力量诱致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三,从内容上看,“温州模式”涉及家庭工业、推销员、专业市场、联户企业、雇工与挂户经营等诸多方面,内容比较丰富;而“义乌模式”则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市场的空间扩张与形态升级是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因,显得比较单一。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区域经济模式的形成,都有其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 and 历史文化根源,并因而形成自身的鲜明特色。

“义乌模式”的鲜明特色是: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促使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进程。

(一) “义乌模式”溯源:特有的商业习俗和地域性商人群体

义乌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了商品—市场经济的萌芽。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萌芽和先发优势的形成与义乌特有的历史和文化沉淀具有内在的联系,与以市镇经济为载体的事功哲学和商业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不能说,义乌小商品市场直接就是事功主义哲学和市镇经济的产物。^①笔者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文化渊源,是商业历史文化的另一分支,即小商品交换所内生的底层百姓的商业习俗文化。义乌农民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也不是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而是高于理论的民间商业传统。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缺乏经济理性精神,而民间商业精神又遭到官方商业观

^① 许多学者注重从浙江学术史上的功利主义哲学和江南历史上独特的市镇经济的角度,诠释浙江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和市场先发优势,这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笔者认为,虽然浙东事功学派“义利兼顾”的从商观和江南的市镇经济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早期萌芽,在商业文化层面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之前,浙江省一些与义乌具有相同商业文化背景的县(市)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专业市场,但是,后来,随着市场范围的拓展、农村工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许多区域性专业市场出现了萎缩之势。相反,义乌小商品市场则在每一个关键时期都把握住了发展的机会,在经历了五代市场的变迁后,至今仍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的抑制,只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追求商业利润。义乌的商业文化,体现了典型的民间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领域,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但又不与官方的利益结成一体。义乌的“货郎担”们在小本生意的掩护之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通过商业“游击战”,顽强地发展成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

1. 义乌百姓的商业习俗与商业文化

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里,市镇经济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广大的农村地区依旧是小农经济。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网络中心,市场范围较为集中,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分散,货币缺乏,需求水平远低于市镇,大商人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做生意,因为这些大商人承受不了农村生意的零散性,纵然有雄厚的资本,也只能选择放弃;但农村的商业活动也不是一般农民所可以从事的,因为市场分散意味着做生意的风险很大,利润空间很小,货币又那么缺乏,而没有货币的媒介其交易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农村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做什么生意、如何做生意。在义乌有那么一批农民,在当时无法与市镇经济中新兴的商人阶级相匹敌,但扎根于资本雄厚的大商人所不愿意开发的农村市场。他们一直是那样普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平常,但老百姓的生活却离不开他们。他们虽然没有被著名的学术团体所鼓吹,也没有人为他们摇旗呐喊,但是他们却有着正统文化和体制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无论在儒家文化时代还是在计划经济时期。

义乌人有一个引以为豪的形象雕塑,那就是矗立在小商品市场门口的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拨浪鼓商业文化是相对于以市镇经济的为载体的事功哲学的商业文化而言的,是一种在分散的农村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综合反映。这样的商业活动之所以成为底层农民的首选,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几乎没有货币资本限制的商品交换,仅凭人力资本(吃苦耐劳的精神、讨价还价的头脑、口才等等)就可参与。这种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是一种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交换方式。拨浪鼓商业文化因此也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能从个人的、小规模的活动发展到有组织的商业网络。对于一般性商业组织来说,在从小到大的发展中,个人的逐利活动与组织集体的逐利活动是有相当大矛盾的,个人能做好的交易往往会由于更多人的加入而遭到恶性破坏。而义乌的拨浪鼓生意却避免了这一点,做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这主要得益于

底层老百姓长期形成的财产权利观念，这种观念有助于明晰的排他性产权的形成。

举办大型的活动，需要有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如大型的公益工程、大型的庆典活动。除非由政府出面来组织，或者由市镇的大商人出资出力，分散的农民是很难组织这种活动的。如果要完全依靠底层老百姓，把一家一户农民小规模财力集中起来使用，又与农民追求功利的本性相矛盾。在义乌，具有可以有效地将个人的功利、一家一户的有限财力与大众百姓的公共福利结合起来的前提条件：一是做事情都不盲目地追求形式、追求实际功效的经济理性；二是个人在集体中相对独立的地位，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进入或退出集体。这主要靠财产的独立性来保证，即使是在大型的工程或活动中，财产的所有权都是很清楚地界定的。

义乌农民特有的商业习俗文化，得益于其独特的民间文化背景。他们不贪图形式的华丽，但追求实际的效果，不做出财力之外的决策，但在财产明晰的前提下，相互合作，拧成一股绳，共同开拓大商人不屑于开发的农村市场。摇着拨浪鼓、挑着糖担的义乌农民从一个两个发展到了一组两组，最后发展到成千上万，从临近的州县走到了浙江之外。到了清朝的时候，敲糖换鸡毛杂货的行当居然成为义乌东乡和北乡人谋生的一种重要手段，终于形成了网络密布大江南北的“敲糖帮”。开放小商品市场乃是由“鸡毛换糖”传统孕育的商人团体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形成的合力的结果。没有“鸡毛换糖”，就没有小商品市场和“义乌模式”。

2. “义乌商人”的合作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义乌在农业生产上的比较劣势，促使农民选择了小商品流通的专业化分工。“鸡毛换糖”的交易方式在义乌有一种群体优势。在中国的其他农村地区，各色各样的货郎担并不少见，但都不如义乌的“鸡毛换糖”那样，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一个以农业和农业人口为主、重农抑商的国度中，由农民转化为商人，使他们离开生生不息的土地，在正常的社会变迁之中，一般只能是个别现象；像义乌这样出现大批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且形成“敲糖帮”这样的商人团体是罕见的。而且，“敲糖帮”团体中的成员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在商品信息、商品收购、运输和销售中通过合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必定有打破历史常规的偶然因素。笔者认为，明朝戚继光在义乌招募抗倭的义乌兵，很可能就是发生大转变最早的源头，是大批义乌农民弃农从商的一个契机。

义乌兵不仅创造了义乌农民离农经商的契机，影响了一代代义乌人，而且义乌兵在军旅生涯尤其是在作战中养成的合作精神，对义乌人独特的商